

# 論李奕樵〈兩棲作戰太空鼠〉中的 全控機構成員自我調適樣態

## 一、前言

2013 年 7 月，中華民國陸軍第五四二旅旅部連下士洪仲丘因於悔過期間從事過度激烈、或疑有霸凌或虐待之虞的操練行為，全身出現程度不一之局部器官衰竭與病變，經急救無效，在其退伍前二日宣告不治，得年二十四歲，因其案件疑點及前後矛盾眾多，社會舉眾譁然，而引發大規模政治及社會運動聲討。<sup>1</sup>

事件同年，小說家李奕樵所作短篇小說〈兩棲作戰太空鼠〉於第九屆林榮三文學獎橫空出世（後收錄於其 2017 年出版之個人小說集<sup>2</sup>），小說主題聚焦於軍中階層文化與其自成一格的規則體系，足見洪仲丘事件一出引起的公眾迴響之劇烈，也反映文學創作與社會環境互相積極干涉的緊密互動性。

然而，隨著檢方調查，逐漸還原的案情經過和輕罪判決結果似與大眾的主觀認知產生歧異，軍方對於「霸凌」、「虐待」及「不當處置」的認定也和外界普遍價值展現出一定程度的落差，且歷有獨立於民間司法外的軍法體系來對內部軍人進行懲處，筆者因此對外部環境與軍隊內部之間的社會距離從何而來有所疑問，從而萌生深入研究軍隊體制文化的念頭。

據此，本文將以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的全控機構理論為切入點，試析〈兩棲作戰太空鼠〉中所呈現的軍隊威權體制，探討軍隊作為長時間與外部隔絕的全控式機構如何透過封閉性組織文化和階層關係，促使軍隊成員在壓力狀態下形塑出相異形態的調適樣態，而能達到重構、再塑造軍中自我的效果。

## 二、Erving Goffman 的全控機構理論

### （一）全控機構的規則特徵

---

<sup>1</sup> 監察院（2013 年 5 月 26 日）。〈陸軍司令部、陸軍○軍團○○旅相關主管人員法治觀念不足，法紀廢弛，對於陸軍下士洪○○之禁閉（悔過）處分違反法律實體規定、未依正當法律程序；陸軍○軍團○○旅楊梅高山頂營區禁閉（悔過）室設置不當等情，肇生洪案，影響國軍聲譽至鉅，核有重大違失〉，監察院糾察案文，院台國字第 1032130197 號。

<sup>2</sup> 李奕樵著，《遊戲自黑暗》（臺北：寶瓶文化，2017 年）。後文〈兩棲作戰太空鼠〉文本內容均引自本書。

作為提出擬劇論的象徵互動論重要研究學者，Erving Goffman (1961) 認為，任一團體所自然發展出的生活、社會模式都是合乎該團體內部常理的，即規則因該團體存在而得以被合理化，而成為足具影響力的象徵符號<sup>3</sup>。與此同時，個體往往透過體制、規則為其賦予的位置及地位去認知自己，並對個人所面臨的處境進行接受與否的再詮釋，而在正常情況下，對於自我認知的定錨應建立在多重團體和機構對其所施加的社會角色<sup>4</sup> (Erving Goffman, 1959)，在不同的生活場合服務於不同的體制規則之下，來維持人類複雜而多面的社群互動生活。

然而，全控機構卻對個體施加了全面涵蓋性的監管與控制，實體屏障物的阻隔、個人電子用品的使用限制不僅抹去了受監控者接觸外界的絕大部分可能性，亦使得外部人士難以得知、干涉組織內部所建立的規則秩序，也就是說，從全控機構徹底瓦解了生活中主要層面的疆界，使個體完全暴露在單一權威（組織）的遊戲規則底下，沒有其他的避風港（shelter）而顯得無所遁形。

全控機構的另一特性則是精準明確的規劃安排，組織生活中，機構藉由集體統一的時程表來引導一大群（少有成員變更的）人在同一時間出現在同一地點，按表操課進行同一項活動——小至洗滌，大至勞務工作等活動——並期待透過這些活動的進行，逐漸累積、重建與機構理想相契合的能力特質和形象，可以說，機構內的規則無非是為了穩定組織發展及達成目標而設置，而被期望有效地作用於每位機構成員身上。

## （二）全控機構成員的自我調適模式

在全控機構之內，成員往往發展出「初級調適」及「次級調適」兩種方向的自我調適（adjustment）模式。基於全控機構的特性與其背後指向的最終目標，個體過往的所有社會歷練，在進入了全控機構這一嶄新的社群團體之後，都可能被以另一種特定的方式被詮釋和使用，致使完全失去其在原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象徵意義，甚至進一步遭到否定或懲處，促使個體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得以表現出「組織所期望他成為的樣子」，即達到「初級調適」。

「每一種故事都以自己的方式實踐著自由。只要有人把不同的世界強

---

<sup>3</sup> Erving Goffman 著，群學翻譯工作室譯，《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新北：群學，2012年）。以下關於全控機構理論之資料均引自本書，後文不再贅述。

<sup>4</sup> Erving Goffman 著，馮綱譯，《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加在別人頭上，就會發展出地下生活。」(Erving Goffman, 1961)

誠如 Goffman 於〈公共機構的地下生活〉一節結論所言，當個體身處於集體性、去個別化的生活模式再造之中，從「個體」過渡到「機構成員」此一角色的過程中，人們時常感到無所適從，並感到自我被權威抹除、管束，個體因而發展出不同的調適方式以確認自身存在和價值，這些調適方式的特徵是將自我與所扮演的「角色」剝離開來，透過未經組織授權（卻隱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默許）的行為，夾縫中取樂，來避免自身全然成為組織所欲其成為的模樣，而得以在集體性組織文化中維護足量的自我，具備這些特性的調適方式則被稱作「次級調適」。

一般而言，全控機構成員所採取的調適策略往往包含初級與次級調適的特性與目的，使其得以用最為妥適、安穩的方式在被監管的壓力當中倖存下來；故而，初級調適與次級調適並非全控機構成員所採取的調適策略，而是策略中的行動方向，全控機構成員因此展現出不同的調適樣態，後文則將進一步討論〈兩棲作戰太空鼠〉中所呈現出的成員自我調適樣態。

### 三、 軍隊作為一種全控機構

在 Erving Goffman (1961) 提出的分類系統當中，軍隊與寄宿學校、勞動營等機構被視作同一類型的全控機構，其存在理由乃出於某種工具性的需要，舉如寄宿學校的理想是培育對社會有所助益的各領域人才，勞動營藉「再教育」名義，以入獄者來填充特定勞動產業的人力資源，對於軍隊來說，對內防控內亂，對外抵禦外敵侵擾，以求維持社會安定，則是其設置的主要目標<sup>5</sup>（錢淑芬，2004）。

誠然，軍隊以其嚴格的訓練綱領聞名，然，軍隊對受訓士兵的期待，並非希望人人都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事人才，而期待他成長為一名合格的軍人，即謹守嚴明紀律、對指令絕對服從、以集體為優先的行動模式。為此，軍隊內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施化制度來促使個體完成軍隊社會化，劉彥佑<sup>6</sup>（2011）認為，這套施化流程實際上始於入營前的剃髮儀式，透過徹底改造外型、抹去個人色彩，剝奪新兵原有的身分套件（identity kit），以求將「集體一致」的行事準則嵌入新兵的意識當中。

---

<sup>5</sup> 錢淑芬著，〈全控機構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化：以國軍初官養成機構的模塑制度為例〉（2013年），復興崗學報，第 103 期，147-174。

<sup>6</sup> 劉彥佑著，〈軍校新生制度化生活經驗之研究〉（2011年），碩士論文，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社會工作研究所，論文網址：<https://hdl.handle.net/11296/66a29b>

正式入營後，領導操練的長官一面向新兵宣導瑣碎的內務規定，一面包含蘊含特權系統與迴圈效應的賞罰機制<sup>7</sup>（董珣均，2021），受訓者在此間感受到巨大的壓迫，日後卻往往複製與此相似的訓練模式，施加於後進士兵身上<sup>8</sup>（畢恆達、洪文龍，2006）。從剃髮的例子，可以看到軍隊如何藉「毀容效應」對新兵的團體感進行再製與強化，再透過長官給的「下馬威」，認知到自己在軍隊場域中的定位，而得以在機構內部建構出穩定、紀律分明的上對下制度。

#### 四、〈兩棲作戰太空鼠〉中的三種成員自我調適樣態

在選用文本當中，「兩棲作戰太空鼠」是軍隊中資深士兵「玩弄」老鼠的一種方式，文中，班長將充氣的塑膠袋套在老鼠頭上，再綁著石頭丟進裝滿了水的水桶裡頭，任其在水面上上下下浮載浮沉。實際上，作為小說標題與經誇飾處理的象徵符碼，「兩棲作戰太空鼠」不僅明示文中軍隊內部所維持的規則暴力，更指代了軍隊成員在調適過程中面臨的「兩棲」狀態，以下將以全控機構理論所提及的三種調適樣態——轉化、不妥協及保持冷靜——解析文中呈現的成員調適樣態及形塑過程：

##### （一）轉化——擁抱體制的軍隊學長

在軍隊當中，上級士兵被視為有義務管教、引導下級士兵成為一名守紀律、體能合格的軍人，就像高中校園中的技藝、表演型社團一樣，由學長姊為學弟妹樹立嚴格的禮節規範與上對下的教學模式，以求完整傳承前人的經驗和技能，軍隊內部也一樣，讓經驗傳承妥善運作的前提便是說一不二的順從，於是，〈兩棲作戰太空鼠〉中的學長如是說明他們的苦心：

「沒辦法，主官不夠嚴。大鬼不恐怖，小鬼就會亂。」（頁 38）

每一梯新兵入伍，都在精挑細選之下被挑選出幾個「小鬼」出來殺雞儆猴，他們通常不合於軍隊的群性，比如人格太過「光亮」的蛋皮人、表現孤僻的主角「我」，從而促使全體新兵感受到自我被侵犯的威脅：

回到寢室，我拖鞋，從布鞋裡掉出半顆鼠頭。

我跟鄰床的學長說，我被盯上了。（頁 19）

<sup>7</sup> 董珣均著，〈軍隊陽剛職場經驗初探——以男同志視角為例〉（2021年），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論文網址：<https://hdl.handle.net/11296/35rxge>

<sup>8</sup> 畢恆達、洪文龍著，《GQ 男人在發燒》（臺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

最為典型的侵犯便是在布鞋中找到鼠屍這類——有如中學生在被霸凌者桌上書寫辱罵字眼——無從指認真兇的精神污染。有時，資深士兵也透過實際的類體罰行為來恐嚇新兵，狡猾的是，學長們似乎都不願意髒了自己的手，而往往藉菜兵之手，對其他菜兵施加壓迫。

在〈兩棲作戰太空鼠〉中，就有一幕由班長威逼利誘促成的、蛋皮人與「我」之間的性接觸：

「蛋皮人在他的人生裡一直找不到女友，耶穌<sup>9</sup>啊，你可以讓他射一發嗎？……形式不拘，用手用嘴用屁股都可以。」班長笑說。（頁 36）

無論行使侵犯的手段為何，在軍隊體制的脈絡之下，這些侵犯都被輕易地簡化為大兵對菜兵的施化，而非惡意的霸凌或虐待。為了合理化軍隊內惡整新人的行為，學長們不惜祭出源於集體凝聚力的情感召喚：

「團體之間還是要互相關心啦，如果被孤立在社會外會很辛苦喔……大家都不想當兵啊，但既然進來了就好好當嘛。」（頁 36）

與此同時，可以想像的是，在更早之前，類似的「關心」也曾發生在學長們身上，就像《精神病院》一書對經歷「轉化」的慢性病患描述一樣，學長們「完全支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折磨，以便在不久的將來加諸在別人身上」（Erving Goffman, 1961），他們在一連串正式與非正式的施化過程中，歷經一番「內向投射」<sup>10</sup>，領略到施加於自身的「暴力」從何而來，而欣然擁抱這一切體制與其附帶的道德價值判斷，並對後進之輩使用他所習得的權勢暴力，這在軍隊當中被視作必要的磨練，會帶來持續性的「正向能量循環」。

但是，不同於精神病院作為全控機構，機構人員與收治者之間極難發生流動變化，在軍隊作為全控機構的情況之下，待得更久的士兵被認為有引導後進士兵的義務，並得以透過採取「轉化」策略，行動表現趨同於機構人員，對其他收治者使以管控，學長學弟制因而能在軍隊內部實行。然而，階層地位隨時間流逝而扭轉的組織文化，即便為新進士兵提供了可預見的翻身未來，卻未必在每個人身上都行得通，軍隊當中的「轉化」因此隱含了長期蓄勢待發的危險性，使平衡隨時可能遭到破壞，而可能觸發個別成員的強烈抵抗與叛亂。

<sup>9</sup> 「耶穌」是主角「我」在軍隊當中的綽號，因其對欲望的克制與內斂性格而得名。

<sup>10</sup> 內向投射（Introjection）的基本概念來自 Sigmund Freud（1921），即將外部主體的一部分行為模式、性格特質向內投射到自我身上，並內化為其人格特徵。Sigmund Freud 著，楊韶剛譯，《超越快樂原則》（臺北：知書房出版，2000 年）。

由此可見，軍隊內階層制度的不穩定性昭然若揭，而這也引出了文本中的另一調適策略，即「不妥協」。

## （二）不妥協——抵抗規則的禁閉室個案

作為全文開頭，以命令式的口吻，主角「我」與關入禁閉室當中的「個案」一同為〈兩棲作戰太空鼠〉的故事拉開了序幕：

沒有威嚇。我只是輕說了聲：跑。（頁 14）

作為全篇小說第一個被描摹形象的角色，負責監督他的主角在一旁觀察，形容他跑步的姿態「不像一個人，而像一只無奈的鉛錘」（頁 14），忠實地執行降臨在他身上的處罰，那麼，他是如何來到這裡的？

關於「個案」所違反的規則，小說內並未詳述禁閉室個案實際「犯行」的情況，僅由主角輕描淡寫地帶過：

我想問他，為什麼非得將自己裝成一個瘋子，非得試圖毆打軍官，非得試圖用這麼笨拙的方式逃離。（頁 16）

很難想像，一個外表看來絕對順從、對指令反應迅速的新人士兵，會因為攻擊上級軍官而被關入禁閉室，因此，他的動機便顯得十分耐人尋味了。實際上，這位新兵在進入禁閉室之前，還發生了一件插曲：

據說這傢伙進來禁閉室那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緊緊擁抱護送的女士官。不是襲胸，不是強吻，是緊緊地擁抱。（頁 16）

從新兵突發的擁抱行為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看見某種近似感激、喜悅的情緒在他身上迸發出來，同時，他的行為也不被視為帶有惡意的，與其對上級軍官的攻擊行為一樣不尋常，而這便牽涉到前一小節最後提及的調適策略，也就是向體制表現出「不妥協的行徑」。

在《精神病院》中，收治者「藉由明目張膽地拒絕與機構合作，蓄意挑戰機構本身」（Erving Goffman, 1961），他們表現出時而高漲的個人士氣，以具體行動拒斥機構本身與其加諸於自身的影響，與禁閉室個案的表現有所呼應，不過，弔詭的是，禁閉作為正式的官方處罰方式，卻顯然被禁閉室個案當作規避非正式「遊戲」過程的手段，也就是說，禁閉室個案反過來利用了

明文寫下的規定，向學長們以規訓為名的惡趣味與暴力賞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實為一次強力的反擊，也讓他得以短暫從階層文化中獲釋，將自我守護於相對而言有如避風港的禁閉室之中。

### （三）保持冷靜——冷眼相看的主角

主角「我」作為全篇小說的敘事視角，其處境已在前述兩點略作描述，在此暫時按下不提，並聚焦於其於軍隊當中的道德生涯發展。Erving Goffman（1961）認為，在全控機構之內，階級化的單一權力系統滲透了生活的每一細節，並且嚴格地執行於其中，對於新成員來說，在摸清規則之前，他們將不得不承受長期性的焦慮感，而這也正是被盯上、遭受欺辱的主角「我」所面對的自我擠壓，「我」為此提出關於禮節的大哉問：

「我也很想懂禮節啊。」我問蔣公：「可是我們在違背對方定義的禮節之前根本就沒辦法知道那些禮節是什麼。」（頁 33）

主角的疑問也呈現了全控機構內常見的另一情況，即規則與道德的判斷標準經常隨機構人員的標準而定，而令收治者感到無所適從。有時，為了從規則中尋得一方靜謐，主角「我」看起來簡直像是放棄了一切思考，放棄質疑規則本身的道德問題，又或者是，刻意與個人價值判斷拉開一段不致使自我崩潰的安全距離。主角一面抽離思考，一面又將自己代入慘遭斷頭的、放在布鞋裡的鼠屍處境，而得出無從轉圜的消極結論：

老實說，我不知道站在什麼立場才可以讓自己看起來不蠢。或許蠢才是本質，存有正確答案是僥倖。（頁 25）

在歷經一番內在與外在的拉扯之後，主角也成為新一梯入伍士兵的前輩，成為前輩的他也習得如學長一般大聲喝斥新兵的技巧，而懂得如何讓新兵恐懼，看似無限趨近、學習並內化了學長的行事作風和禮制準則，但是，決定主角「我」並未全然轉化為體制支持者的關鍵，在於「我」作為全文敘事者的時刻抽離與反思，「我」從未對連隊內的遊戲規則做出肯認，而僅僅為了留存自我的最後一點餘地，順應、屈服於要求他加入體制當中的權勢之下，作者將「我」內心的質疑和探問掩藏——正如「我」在軍營中所學到的那樣——在文藝性的敘事筆法之下，而顯得格外尖銳：

我不免開始認真思考，為什麼籠中鼠會在輪上奔跑？還有，為什麼我可以忍受呢？作為一個觀看的人。（頁 15）

然而，回溯到「兩棲作戰太空鼠」這一玩弄老鼠的方式，作為符號而首次出現在文本當中的時間點，會發現是在主角「我」回應了學長們的呼喚，自願成為「刑具性耶穌」之時，主角對權力結構的屈從作為一把鑰匙，正式開啟了他的「兩棲」生活，此後，學長們要求「我」對新兵進行的性侵犯行為一律被稱為「任務」，直到後進士兵如恐懼學長一般，恐懼「我」，主角才總算成為執掌權勢的一份子，成為禮節並實踐禮節，完成了行為上的轉化，同時在心態上保持冷靜（playing it cool），可以說，在真正「弄髒自己的手」之前，主角都從未真正意識到其在這場遊戲中的參與，是行動驅使他往下一個階段邁進，並建構了這套思行斷裂的生活模式，而得以藉「次級調適」策略適應其中，成為他人的學長，也成為了禮節本身。

## 五、 結論

〈兩棲作戰太空鼠〉因其發表時效性和議題性，通常被視作洪仲丘一案的紀念之作，然而，若意圖細究這一虛構故事發生的「時間點」，便不難發現作者在全文開頭所悄然埋下的暗示：我們將注意到，文中的「禁閉室個案」實際上更可能出現在洪仲丘事件後，少有連隊再使用禁閉系統懲處士兵的時空脈絡之下，而恰為該事件引發的後續效應，擔心「監視器故障」的中士亦可被視為對「完全沒有畫面<sup>11</sup>」此一案件插曲的映射。無論從小說的禁閉室個案或現實國軍對禁閉系統的檢討<sup>12</sup>來看，都可見機構內部迫於外部社會的干涉與聲討，被動地對行之有年的制度體系與老舊的硬體設備進行「汰換」，看似在不影響組織目標的情況下，彌補了制度對人權的忽視和設計上的缺失，然而，來自外部的暫時性審查與規則的修訂是否真能意味著組織文化的徹底扭轉？

從「禁閉室個案」埋下的暗示來看，筆者主張，作者所意圖透過〈兩棲作戰太空鼠〉來處理的，其實並不只限於洪仲丘事件背後反映的制度問題，而是，即便實質上的制度已然名存實亡，因為規則已然在個體身上發揮作用，個體將帶著自身持有的生活方式，延續並促使已消滅的制度在其他機構區塊中以全新的樣貌被分化出來，就像小說中近乎走入歷史的禁閉室制度，這一條路走不通，還能有其他方式來達到恫嚇新人的目的，也就演化出了將成員視如鼠輩的「遊戲」，伴隨機構目標而生之權力結構體系也難以遭到撼動，個體所能做出的選擇，僅有這些不斷變化、增生的不成文規則與私刑朝自己襲來之時，決定以何種姿態自居而

---

<sup>11</sup> 洪仲丘事件調查期間，時任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曹金生通過媒體談及 269 旅禁閉室中疑似毀損之監視器畫面時，數度給出「有檔案，完全沒有畫面」的回應，而被大眾視為避重就輕、軍方有湮滅證據可能的證據，後桃園地檢署介入偵查，表示監視器的黑畫面乃因設備老舊所致，乃軍方因習以為常而未呈報致使之疏失。

<sup>12</sup> 禁閉制度已於 2015 年 9 月 14 日修訂為「悔過室設置辦法」。悔過室設置辦法（2015 年 9 月 14 日）



做出相應的行動。

於是，相較於自認「屈服」的、被抽調支援禁閉室衛兵的主角，禁閉室個案與長官發生衝突，因而來到禁閉室這一過程，則被主角「我」視為「逃離」之舉，甚進一步稱之為「逃兵」，然而，即便是成為禮節本身的主角自己，也無法對屈服和逃離二者之間的孰是孰非做出肯定的判斷，因為「我」心裡明白，若要維持個人目前的狀態不致動搖，繼續以「正向能量循環」這一飄渺而荒謬的概念管理情緒、欺騙自己是必要的，也使得「我」可以抽離、可以做出與其他大兵相對而言稍嫌溫和的舉措，卻不能承受進一步深入思考體制對自身造成的改變與去道德化的「遊戲過程」，個體無力感與組織制度之間的惡性互動，將是「我」與其他部隊成員所共同面臨的困境，或許，也正是〈兩棲作戰太空鼠〉所欲提出的探問。

## 六、 參考文獻

### (一) 期刊論文

錢淑芬，〈全控機構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化：以國軍初官養成機構的模塑制度為例〉。《復興崗學報》，第 103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7-174。

### (二) 碩博士論文

劉彥佑，《軍校新生制度化生活經驗之研究》，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董珣均，《軍隊陽剛職場經驗初探—以男同志視角為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 年。

### (三) 書籍

李奕樵，《遊戲自黑暗》（臺北：寶瓶文化，2017 年）。

畢恆達、洪文龍，《GQ 男人在發燒》（臺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

楊韶剛譯，《超越快樂原則》（臺北：知書房出版，2000 年）。原作者 Sigmund Freud, 1920, *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Leipzig: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群學翻譯工作室譯，《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新北：群學，2012 年）。原作者 Erving Goffman, 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America: Anchor Books.

馮綱譯，《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原作者 Erving Goffman,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America: Anchor Books.

### (四) 其他

監察院（2013 年 5 月 26 日）。〈陸軍司令部、陸軍○軍團○○旅相關主管人員法治觀念不足，法紀廢弛，對於陸軍下士洪○○之禁閉（悔過）處分違反法律實體規定、未依正當法律程序；陸軍○軍團○○旅楊梅高山頂營區禁閉（悔過）室設置不當等情，肇生洪案，影響國軍聲譽至鉅，核有重大違失〉，監察院糾察案文，院台國字第 1032130197 號。

悔過室設置辦法（2015 年 9 月 14 日）